

我和李小林的一段文缘

(艺海回眸之二)

□ 吴育华

1977年1月，那是个大雪纷飞又催人奋进的冬月，每个文学青年的胸中都涌动着创作的激情。《杭州文艺》（西湖）到建德寿昌举办笔会。那时，薛家柱老师已是副主编。一起来的还有小说编辑，叫祝鸿生。我当时写的是一组歌颂周总理的诗歌，跟祝老师没什么交道，只是点点头而已。但我知道，他是文学大师巴金先生的女婿，爱人叫李小林，在《浙江文艺》（东海）当诗歌编辑。

夫妇俩为什么一道来杭州工作呢？这完全得力于薛老师的鼎力相助和精心安排。1974年，巴老还在上海奉贤“五七干校”劳动时，夫人萧珊病逝，小儿子李小棠已去农村插队落户，大女儿李小林由上海戏剧学院毕业，不能留沪，被掌管文教大权的人硬生生要“分配”到外省去，这样，70多岁的巴老身边就没有亲人了。

正巧，薛老师由一位朋友引荐，第一次去拜访巴老，听说此事后，建议李小

林到杭州来工作，杭州上海距离近，来回跑也方便，巴老欣然同意。薛老师回杭后，向杭州市文化局局长沈晓泉作了汇报，沈局长惜才如命，当场拍板敲定。杭州，张开了热烈好客的双臂，用博大的胸怀拥抱着上海“送”过来的两位人才。

巴老是中国文坛的巨匠，女儿李小林又在《浙江文艺》当诗歌编辑，何不拿几首诗去登门讨教一番呢？主意已定，我挑了两首自己比较满意的诗歌。在一个丹桂飘香的十月天，我去梅花碑省水利厅开完宣传工作会议，就转道去《浙江文艺》编辑部。过少年宫，穿幽深的建德路，就到了2号省文化局大院，上二楼，踩着吱吱响的地板，楼道尽头，就是诗歌编辑室。敲门，推门，李老师正在埋头看稿子。

一眼望去，李老师的眉宇间长得跟巴老一模一样。不过，毕竟李老师年轻漂亮，年纪估计跟我大姐相仿。听说我是建德来的，李老师眉毛一扬，站起来热情

地打招呼：“嗨，建德来的？鸿生还去你们那儿组过稿子，《杭州文艺》4月份出过你们的专号。”

我恭恭敬敬地递上两首诗：《煤海放歌》《评“红旗车厢”》，请她指正。她快速地浏览了一遍，指着《煤海放歌》这首，抬起头问道：“你在煤矿工作？”

“部队回来后，在新安江水泥制品厂做宣传工作。不过，在部队野营拉练时到过长兴，跟首长一起下矿井参观过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好，明白了。这几句写得很精彩。”她开始轻轻地朗诵起来：“海上的渔歌虽然高亢嘹亮/我们的劳动号子却更加豪迈/如果不是把嗓门压底八度/准会把坑道的支撑木震歪！”她抬起头来：“这首留下吧，备用。”

二选一！我喜出望外，连连表示感谢，正准备离开，“等等。”她若有所思地定了下神，突然从办公桌那一摞书籍杂志里抽出一本厚厚的书来，翻看着。我眼睛一亮，这正是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诗集《怀念敬爱的周总理》，那装帧那纸张都是一流的，书名是烫金的，还散发着浓郁的油墨香味。郭沫若、郭小川、李瑛等著名诗人的作品都选在里面。209页，就是我的组诗《写在新安江畔——献给敬爱的周总理》，而且占了整整10个页码！

“怪不得，名字有些熟悉。”她不解地抬起头来问道：“这么有才气，为什么没在部队提干？”

我沉默了。那年我才27岁，轻轻地说出父亲的“历史问题”。李老师缓缓地站起来，定定地看着我，眼睛里慢慢地蒙上了一层淡淡的云翳，我的心在战栗。也许，她也想起了孤独一人在



上海的巴老。不过，她马上释然了，像大姐似的安慰我：“好了，都过去了。以后有好作品再拿来看看？常来编辑部走走。”

我的那首《煤海放歌》就发表在1978年《浙江文艺》4月号上，以后又收入了诗集《十月的风》。那首《评“红旗车厢”》也收入了诗集《新长征》。

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，不久后又遇到了她的先生祝鸿生。由部队转到地方后，我写出了第一篇小说《传统》，投哪儿呢？当时杂志界有四大名旦：上海的青春、武汉的芳草、杭州文艺、广州文艺。当然投家乡的《杭州文艺》，稿子由小说编辑祝鸿生处理。

祝老师写来了热情洋溢的长信。那行云流水般的笔触，跃动着编辑对作者的殷殷期望，读得我热血沸腾。

他首先是对稿子的充分肯定，其次是两个小细节不合生活常识，要动些小手术。不久，小说就发在1978年《杭州文艺》8月号的头条。

巴老终于迎来了春天，1978年年底彻底平反。李小林和她的先生双双调回上海，回到巴老的身边。李老师到《收获》杂志当编辑，成了巴老工作中的得力助手。我想，巴老“文革”中受到那么大的冲击和摧残，还能活到101岁，与李老师的悉心照料是分不开的。祝老师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文学编辑，那部轰动全国的由刘晓庆主演的武打片《神秘的大佛》，他是编剧之一。才2角5分的电影票，竟创下1个多亿的票房收入！

我常常回忆那时编辑与作者之间，没有物欲没有金钱，只有鼓励和提携，水晶般的美好时光。



李小林（后左）与巴金在杭州西湖

禁止非法活动



停止不文明行为



将文明风尚进行到底



加快建设美好家园步伐



弘扬文明新风，建设美好家园

